

吴 泽 主 编
李 华 选 编
苏 双 碧

吴 泽 主 编
李 华 选 编
苏 双 碧

光明日报出版社

吴晗史论集

· 中国当代史学家丛书 ·

吴 泽 主编

李 华 选编
苏双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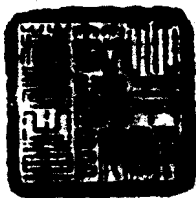
DB08/31

DB08/16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20543



光明日报出版社

1120543

吴晗史论集

中国当代史学家丛书

吴 泽 主编

李 华 选编
苏双碧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天津静一胶印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125印张 380千字

1987年8月第一版 1987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700册

统一书号: 11263·013 定价: 3.70元



《当代史学家丛书》编辑说明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祖国经历了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历史变革。在这汹涌澎湃的历史进程中，由于时代的要求，史家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里，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各自以其史学研究的成果，作出了丰硕的贡献。我们编辑这套丛书，希望通过它能够提供一个我国当代史学发展的概貌。这对于接受先行史家们的教益，吸取他们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了解当代各家史学的发展情况，进而开展中国史学史的学习和研究，总结当代史学发展的历程，探求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等，都是有意义的。

在这半个多世纪中，革命实践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史学水平不断提高。当代史家们在史学研究领域中，或在史学理论方面，或在治史方法方面，或在史学编纂方面，或在史学论评方面，或在典章制度、文物、历史地理的考辨方面，乃至宗教史料等等，各有其专门或侧重，成果累累。丛书以人为主，选收他们各自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著和致师友的论学手札。

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编辑工作中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恳切希望同志们提出指正批评。在编辑这套丛书过程中，得到各方面尤其是出版社的热情支持，在这里敬致谢意！

吴 泽

一九八〇年四月

《吴晗史论集》是吴泽同志主编的《中国当代史学家丛书》中的一种。《中国当代史学家丛书》分别由几家出版社出版。

前 言

吴晗（一九〇九——一九六九年）是我国著名的明史专家，浙江义乌人。从小喜读文史书籍，他在上海中国公学写的《西汉经济状况》一文，曾得到当时中国公学校长胡适的赏识，时年仅二十岁。后来他决心研究明史，多少带有一点偶然性。那是一九三一年上半年，吴晗在燕京大学图书馆读线装书时，找到一本《葵书》，其中有吴之器撰写的《胡应麟传》，传中说胡氏的卒年在万历三十年，即公元一六〇二年，存年五十二岁。这个存年，如能得到证实，就能纠正顾颉刚在《四部正讹序》中关于胡应麟存年在六十以上的说法。出于这个动机，吴晗写了长达四万多言的《胡应麟年谱》，考证了胡氏存年确是五十二岁。胡适认为这是一篇“功力和判断都不弱”的文章，并将它推荐给清华大学史学系。据此，吴晗在进入清华大学史学系时，系主任蒋廷黻就劝吴晗“专攻明史”，胡适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劝告”，并要吴晗“训练自己做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二日《胡适复吴晗》）吴晗也表示要照胡适指点的“逐步做去。”（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六日《吴晗致胡适》）吴晗十分勤奋，不尚空谈，在有关明代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仅摘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就抄录了三百多万字，为后人研究明代建州史做了重要的贡献。在三十年代，吴晗还先后写了《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写作时代和社会背景》、《明代之农民》、《朝鲜〈李朝实录〉中之李满住》、《后金之兴起》等等颇具功力的文章。

关于吴晗的师承问题，后来曾经说过，在三十年代，他的治

学之道“受了胡适之极深的影响，治学钻到考据的牛角尖里去。”

（《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九五〇年《中国青年》第三十二期）但是仅从吴晗学生时代的近五十篇著作看，除考据文章外，有些杂文、读书笔记却是说古论今、抨击时政的。这类文章自然不是胡适传授的治学之道的原意，也不是胡适的文风。说明吴晗的治学之道，并非只受胡适一家的影响。事实上胡适当时不在清华任教，直接在清华史学系讲课的是陈寅恪、蒋廷黻、雷海宗等人，其中陈寅恪搞考据，并在考据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概括。而蒋廷黻、雷海宗则主要是搞综合概括的。蒋廷黻在清华大学提倡仿效西洋史的研究方法，即在清华史学系创立所谓“新史学”，目的在于区别考据学派的治学方法。“新”的含义其实是指“研究中国历史，最好用西洋的史学方法”，即“综合”的方法。因此，在教学上他主张“中外历史兼重”。把学生学习西洋史课程当成是“史学方法的一个表演和一个练习。”（《历史学系概况》，《清华暑期周刊》一九三三年迎新专号）吴晗在清华读书，蒋廷黻是直接授课老师，他的这些主张，对吴晗自然也会产生影响的。另外，吴晗的好友，当时已经是教授的张荫麟，对吴晗也很有影响。张荫麟文笔清新，思想活跃，写历史文章不主张过多引用原文。他的学风，也很受吴晗欣赏。

由上可知，三十年代，吴晗在接受胡适治学道路影响的同时，也接受了陈寅恪、蒋廷黻、张荫麟等人治学方法的影响。同时，由于他博览群书，喜欢读报，也受到刚在史学界流传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这些影响使吴晗在抗日战争中逐步改变自己的历史观。并在四十年代以后，以历史研究作武器，激烈抨击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脱离了胡适的治学道路。他的历史杂文在昆明民主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三十年代，中国史学界就其历史观和方法论来看，不外有三种：一是旧史学还根深蒂固，这股势力不论是研究方法，还是

新

研究对象，都和封建史学没有本质的区别；二是所谓“新史学”，提出仿效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这部分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史学；三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历史，这只有小部分进步史学家在进行探索，并开始出现了一些成果。吴晗的历史观，基本上是属于第二类，即资产阶级的历史观，但在某些方面开始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最能说明吴晗当时历史观的是一九三五年四月三十日，吴晗为天津《益世报》的《史学》专刊写的发刊词，在这个《发刊词》中，吴晗宣布：

“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了，理想中的新史当是属于社会的、民众的。”这便是吴晗提出“新史学”的主要含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史学》专刊发表的文章大多是研究农民、农民战争和匠户的，研究帝王将相的文章为数很少。从这个“新史学”的含义看，多少包含一些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认识。

但是，研究对象的转移，尽管在当时是属于进步的潮流，但它却不等于已经是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历史了。吴晗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由于幼年时家境困难，我自然对农民中生活富裕的大地主不满意，对农民同情。无论是我的第一篇论文《西汉经济状况》——那时候还根本不知有马列学说，还是一九三二年写的《明代之农民》、《明末的仕宦阶级》，和一九四七年写的《朱元璋传》，对农民痛苦总是详言之，对农民革命则寄予无限地关切和向往。”（《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这段话说明吴晗对农民的痛苦生活寄予深刻的同情。例如，在《明代之农民》一文，就尖锐地揭露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文章指出，“科敛之害，甚于虎狼。”农民除向国家交纳田赋和服力役之外，“还要对地方官吏、豪绅、地主……尽种种义务，他们要受四种甚至五种的剥削。”而明太祖对农民所处的地位，则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吴晗指出：“明太祖认为农民的本分是纳赋和力役”，他“要农民安于本分，使永不离其所耕种的土地。”可见吴晗是

同情农民，站在农民一边鞭挞地主阶级的。但这并不是说，吴晗在三十年代就已经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历史了。吴晗同情农民，但农民的出路何在？他并不知道。就在《明代之农民》这篇文章里，他在详尽地阐述了农民的痛苦之后，却写了这么一段话：郧阳一带多山，地界湖北河南陕西三省间，又多广土，山谷厄塞，林著蒙密，中有草木，可采掘食。正统二年岁饥，民徙入不可禁，聚至多，无所稟约束，从此不再有任何压迫，也不再有任何负担，自耕自食，真是农民的理想生活。

其实，在封建社会里，经常出现这种农民逃匿山林的现象。这些逃匿的农民，即使暂时安定下来，为时也不会长久的，外来或新产生的地主，照样会来压迫、剥削他们。那种“自耕自食”的“理想生活”，在封建社会是不会出现的。这说明吴晗虽然同情农民，却不了解阶级斗争的规律，自然也不可能替农民找到一条摆脱困苦的路。到一九四零年以后，吴晗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他认为在困难当头，专攻支离破碎的考证是没有用的。当他走上抗日反蒋的道路时，也就把研究历史和现实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反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昆明的民主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他的历史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四十年代，吴晗在《论晚明“流寇”》一文中，就不再认为封建社会的农民有“自耕自食”的“理想生活”了，而是明确地指出：“地主阶级利用他们所有的财力，和因此而得到的特殊政治势力，加速地加重地剥削和压迫农民，吸取最后一滴血液。农民穷极无路，除自杀，除逃亡以外，唯一的活路是起来反抗，团结起来，用暴力推翻这一吸血鬼集团，以争得生存的权利。”所以，他认为，农民起义，是统治阶级残酷剥削的结果，是“政府的上下当局所造成的。”对农民出路的认识，说明吴晗已经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了。

吴晗一生最重要的代表作是《朱元璋传》，这部著作最早胚

胎于一九四三年写成的《明太祖》一书。吴晗后来在《朱元璋传》自序中说：“由于当时对反动统治蒋介石集团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就不免“指桑骂槐 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皇帝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但吴晗在后来改写《朱元璋传》时，对这个元末农民领袖，又是维持二百多年统治的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作出了实事求是地评价，指出：“朱元璋有许多功绩，也有许多缺点，就他的功绩和缺点比较起来看，还是功大于过的。他是对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的前进起了推动作用的，是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在历代封建帝王中，他是一个比较突出、卓越的人物。”从《朱元璋传》的前后版本看，可以看出，吴晗不但能够熟练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历史，而且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也运用自如。

新中国成立后，吴晗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作出过重大贡献，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共出版了二百余种。为了普及历史知识，吴晗奔走呼号，他说，要把历史知识“普及给全国人民，要使人人懂得点自己和别的历史，掌握社会发展规律，认识自己的前途，并通过历史的学习，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党，热爱人民，信心百倍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中去。”（《论历史知识的普及》，《文汇报》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应该说，这套小丛书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曾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

吴晗是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从一九四三年加入民主同盟以后，他一步一步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一位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但在十年内乱中，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为了怀念这位杰出的史学家，选编了这个集子，共收入三十二篇学术文章，按作品发表年代的顺序进行编排。为忠于作者原意，选编时对作品均未作改动。

苏双碧

一九八五年二月于北京沙滩

目 录

前言	(1)
西汉经济状况	(1)
昆仑奴考	(5 6)
明正德本《李征伯存稿》跋尾	(6 5)
西王母的传说	(6 7)
说《水浒传》(明史札记之一)	(8 8)
《梅龙镇》本事考(梧轩杂记之一)	(8 9)
香山碧云寺(梧轩杂记之一)	(9 2)
《今古奇观》(梧轩杂记之一)	(9 3)
胡应麟年谱	(9 5)
清华大学所藏档案的分析	(159)
胡惟庸党案考	(173)
明代的殉葬制度	(212)
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	(214)
朝鲜《李朝实录》中之李满住	(223)
明代之农民	(249)
元明两代之“匠户”	(278)
后金之兴起	(295)
明代汉族之发展	(324)
论晚明“流寇”	(332)
钱牧斋之史学(永宁札记之一)	(338)
历史上的国民身份证——传·过所·路引	(342)
中古时代的水力利用——碾、碓、碓	(352)

《明太祖》和《从僧钵到皇权》	(357)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些问题	(363)
谈曹操	(372)
谈迁和《国榷》	(382)
论海瑞	(399)
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	(420)
历史教材和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429)
影印《明经世文编》序	(435)
论历史知识的普及	(443)
关于研究历史的几个问题	(458)

西汉经济状况

一 绪论

读过中国史的人，都知道西汉是中国史上的一个最重要的时代，都承认刘彻、王莽是这个时代中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从公元前二〇六到公元二二年，这二百二十八年中，一面结束了公元前一千五百年的旧帐，一面下启至公元一千九百二十九年的规划。截至一九一二年的国家设施行政，都还因循着而无大更革。刘彻是历史上的空前的大创制家，王莽是历史上的空前的大改革家。他们两人的创制和改革，一直影响到现在。他们使中国经济史起了空前的大变化。他们确定了当时及后代的社会的命运。

在制度方面说：土地制度、货币制度、赋税制度，都在西汉时代确定规模。就经济政策方面说：征盐铁、榷酒酤，是在西汉时最认为重要的两件事。农本主义，困商政策，更为二千年所继承的根本政策。就思想方面说：名田说、限田说、王田、私属法，都是二千年后平均地权说的权舆。西汉的二百二十八年中，产生了一切后代所奉行所继承的制度、政策、主义、思想。这是如何重要的一个时代啊！

但是使我们不满意的，是史家记载关于这时期的社会经济不很详细，以致我们不能详确的综合观察、比较、探讨。我们抱着十二分的惋惜态度，来追悼这可贵的史料，在史家的笔下轻轻失去而幻灭，而沉失在黑暗中！

二 西汉历代的财政

汉兴，承秦之敝，民作失业，流离饥馑。米石五千钱，马匹

直百金，民无盖藏，大农仰屋，天子不能具醇醪，将相或乘牛车。财政的恐慌情形，可以想见，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以期与民休息。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百姓。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人，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取于国家。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当时经济学者鉴于战国秦代本末倒置之弊，乃重本抑末，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于是农民滋殖，盖藏日富，孝惠、高后之间，天下大定，复弛商贾之律，但令市井子孙，不得入仕籍。孝文初，除盗铸钱令，乃民竞逐末，弃捐农事。吴王、邓通，钱遍天下，游食之民既多，淫侈之俗日长，帝乃躬厉节俭，开籍田以劝农，数年之间，帑藏充实。景帝益事贮蓄，诏三十而税一，为汉永制。至武帝之初，家给人足，仓库尽满。京师之钱，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红腐不可食。国用富溢，至斯极矣。乃外事四夷，内侈宫室，百姓劳苦，干戈日滋。百姓抗敝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人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终武帝之世，算商车，置盐铁官，算缗钱舟车，榷酒酤，重敛诛求，民不堪命。昭帝即位，与民休息，令民得以律占租。宣、元、成、哀、平五世，率由旧章，无所更革，故虽屡蠲租赋，而国用颇裕。王莽代汉，更絃易辙，农商失业，食货俱废，边兵二十万人，仰县官衣食，用度不足，数横赋敛。又一切税吏民货三十而取一，公卿以下至郡县黄绶吏，皆保养军马，徭役繁剧，旱蝗相仍，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上至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禄，舍私赋暴敛，无以自存。盗贼蜂起，民不聊生。然而莽败时，省中黄金且有六七十万斤，金玉财物充牣御府，朘削齐民，私自封殖。此莽之所以亡也。

三 西汉的平民生活

有人说：看完一本京师同仁堂的破帐簿，可以窥见二百年前

的生活状况，同样地我们在《汉书》上、《史记》上，找到一两条不完备的断文烂句，也可以推想到汉代的平民生活，是如何的简单，如何的朴素，如何的值得后人留恋、追念。

纪元前三百五十年的平民生活——“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一百五十石。除什一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一千三百五十。除社间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钱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人岁终用钱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这是一个非常翔实而又精确的古代农民生活状况的报告。他们辛苦了一年，可是还得亏空四百五十钱，倘使运气不好，那简直要没法应付一切的不幸事件。至于女人的生活：“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日夜连工，一日夜要做十八个钟头的工作。可是在任何记载上，绝对的寻不出她们的抗议或嗟怨的辞气。因为不如此便不能维持家庭最低的生活，而使男人的负担越重啊！根据上文的记述，得公元前三百五十年农民生计支配表如下。（表见下页）

生活程度的高低，是视国家或社会的安谧与否而转移的。用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一石米价钱的高下，可以看出旁的物件的价格，同时也可以知道社会之就序与否的情形。因此就我能力所及的，作西汉米价表——“秦汉时米百二十斤为石，乃权名，非量名。”——（《十七史商榷》）。（表见第5页）

汉人饮食，除谷类、茶、酒外，有面粉。《学斋咕哔》：“王莽始有啖面之文。”普通制作饮食之法，率以：

盐豉（见宋玉《九辩》：“大苦咸酸，”注及《史记·货殖列传》、《前汉书·食货志》。）

醋（《汉武内传》：“但醋作酢。”）

密及蔗浆（密见《汉武内传》，蔗亦作柘，柘浆见宋玉《大

一夫治田百亩	消费者	收入	支出		剩余
	五口	粟一百五十石	1	2	四十五石为钱一千三百五十
			赋税十五石	终年五口之食九十石	
冬夜妇人工作每日十八小时	五口之衣			千五百文	
	社春 间秋 尝之 新祠			三百文	
				不足 四百五十文	总计 千八百文

招》，《汉书·郊祀歌》：“柘浆析朝醒。”）

香料除姜桂外，多用蒜薹及脂麻。张骞使西域得苜蓿，香菜也。

制作肉食，别有烧割之一法，刘熙《释名》：“貂炙”全体炙之，各自以刀割食。

喜食犬、牛，故屠牛椎狗之事，豪杰亦为之。嗜酒之风太甚，高祖初定天下，廷臣使酒争功，高祖颇厌之。武帝乃榷酒酤，非特用以防民食之不敷，亦以严费时佚事之禁也。然未几禁弛，群饮之风如故。此殆汉初军人，多来自民间，旧习未忘，遂播为风气欤！

米斛	米石		米石	米石	米石	米石	物名
	王莽	二年	汉元帝	汉宣帝		汉初	时代
	公元二十年		公元前四十年	公元前七十年		公元前二百年	西历纪元
黄金一斤	二千钱	三千钱	三百余钱	五千钱	万钱	五千钱	价格
光武纪	洛阳东	齐地饥			马一直百金		

王符《潜夫论·浮侈篇》曰：“昔孝文皇帝躬衣戈绋，革舄韦带。而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庐第，奢过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仆妾，皆衣文组彩牒，锦绣绮紈，葛于升越，筒中女布，犀象珠玉，琥珀玳瑁，石山隐饰，金银彩缕，穷极丽美，转相夸谄。”《汉书·五行志》曰：“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剽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可知当时衣服之好尚矣。

衣服的材料多用布及绌（《西京杂记》）、罗（《地理志》）及郭宪《洞冥记》）、纱、段、缯（《蔡邕传》）、葛、麻、有锦绣冠（《舆服志》）、帻、帽（刘熙《释名》）、布巾（《急就篇》）。妇人则有冠子（《事物原始》）。衣之类有汗衫（《中华古今注》）、袄（《物原》），裳之类有袴褶（《舆服杂事》），褙